

梅厄夫人自传

〔以色列〕 果尔达·梅厄 著

MY LIFE BY GOLDA MEIR



新 华 出 版 社

165
0423
246

梅 厄 夫 人 自 传

〔以色列〕果尔达·梅厄 著

章仲远 李佩玉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P

1986.8, 1



CICIR 334675

MY LIFE

by

GOLDA MEIR

Dell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Third Dell Printing-Feb., 1977

根据纽约德尔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版译出

梅 厄 夫 人 自 传

〔以色列〕果尔达·梅厄 著

章仲远 李佩玉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插页2张 321,000字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7,300册
统一书号：3203·088 定价：3.00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梅厄夫人(1898—1978)是以色列缔造者之一，以色列第一个女总理，长期担任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最大政党以色列工党的领导，对以色列有极大影响，也是西方著名的女政治家和外交家之一。

梅厄夫人在基辅出生，八岁时随父母迁居美国。青年时代即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21年迁居巴勒斯坦。1934年参加犹太工人总工会执委会，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以色列国成立前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府。她也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以色列国成立前后，在美国为以色列募集大量捐款。她是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上签名的二十五人之一。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曾任以色列第一任驻苏公使、劳工部长、以色列工党总书记和外交部长等职。1969—1974年任总理，1974年6月辞职，1978年12月8日逝世。她辞去总理职务一年后出版的这本自传，实际上是一部以色列的历史，书中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以色列的内政外交政策有详细叙述，书中反映的思想迄今对以色列仍有影响，因此书中的材料对我们研究以色列和中东问题，仍有参考价值。书中一些以色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作者以见证人身份，第一次公开透露的。当然，本书是完全反映她的立场和观点的。

读者自能理解，勿须赘言。

本书1975年在美国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1981年本书在美国拍成电视片，由三次获得奥斯卡金奖的瑞典出生的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扮演梅厄夫人。电视片曾轰动一时。

本书根据美国德尔出版公司1977年版翻译，原书名是：《果尔达·梅厄：我的一生》，内容和安排都按原书，未作改动。

本书翻译过程中，承以色列问题专家徐向群同志热心指点，谨致谢忱。

一九八五年二月

我从来不记日记，也从来不是作家，
我当然从未想过要写我的生平事迹。
但今天，抱着使读这本书的人也许会稍微多了解一些有关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人民情况的希望，我谈了几位我所认识的男男女女，我到过的某些地方，尤其是我参加过的一些难以置信的事件。

果·梅

阿维夫高地

一九七五年六月



果尔达·梅厄
(1898—1978)



果尔达·梅厄和莫里斯·迈耶森
1917年12月24日结婚照

目 录

1. 我的童年	(1)
2. 政治上的成长	(17)
3. 我选择巴勒斯坦	(40)
4. 新生活的开始	(62)
5. 开拓者和问题	(86)
6. “我们要同希特勒作战”	(115)
7. 和英国人的斗争	(147)
8. 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	(187)
9. 驻莫斯科公使	(231)
10. 生存的权利	(268)
11. 非洲和其他人民的友谊	(302)
12. 我们孤立了	(334)
13. 出任总理	(364)
14. 赎罪日战争	(402)
15. 道路的终点	(435)

1. 我的童年

我认为我在俄国的孩提时代，我的头八个年头的点滴回忆，在某种意义上总结了我人生的开始，就是现在人们称之为成长的年代。如果真是这样，可怜这一时期里使我高兴或愉快的回忆太少了。过去的七十年我能记住的零星的事件，大部分涉及我家庭所经历的可怕的窘困，涉及贫穷、饥寒和恐惧，我想我全部记忆中最清晰的是关于受惊的回忆。我一定非常小，可能只有三岁半或四岁，那时我们住在基辅一幢小楼的一层，我依然能清楚地记得听说我们将遭到集体屠杀。当然那时我不懂得什么是集体屠杀，但我知道这同我们是犹太人有关，同一群暴徒有关，那些暴徒经常挥舞大刀和棍棒，搜寻犹太人，尖声叫喊要抓“杀耶稣的凶手”，在镇上蜂拥而过，现在正要向我和我的家庭下毒手。

我记得我站在通向住着另一家犹太人的二楼的楼梯上，和这家的小女儿手拉着手，瞧着父辈试图用木板挡住大门。这次集体屠杀没有发生，但迄今我还记得我多么害怕，而又因为我父亲在我们等着这群无赖来临时，只能钉几块木板来保护我们，使我感到恼火。我尤其记得我当时已经明白我所以会碰到这一切是因为我是犹太人，这使我同院子里大多数孩子有了区别。这是我一生中多次经历的心情——恐惧，绝望，和别人有区别的意识，以及人

要生存必须自己采取有效行动的一种本能的深刻信念。

我也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多么贫穷。向来什么都不够，食物不够吃，衣不保暖，家里炉火也不旺。我总是觉得身上有点冷，肚里有点空。即使在今天，我还能毫不费力地、几乎完整地想起我自己流着泪坐在厨房里，瞧着妈妈把应该属于我的一点麦片粥，喂我的妹妹济普凯的情景。那些日子里麦片粥在我的家是奢侈品，我痛恨必须同别人，即使同婴孩分享。多年后我亲自经历了我自己孩子挨饿的可怕情景，尝到了必须决定给哪个孩子多吃一些是什么滋味。但在基辅的那个厨房里，我只知道生活是艰苦的，到处都没有公正。我的姐姐谢伊娜常常在学校因饥饿而晕倒。我真高兴，当时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

我的双亲是刚到基辅的。他们在平斯克相识结婚。我母亲一家就住在平斯克，几年之后，一九零三年我五岁时，我们全家又回到那里。母亲觉得她和父亲的恋爱史很光彩，常常对我们唠叨这件事，虽然我后来几乎可以把这段故事背下来，我还是百听不厌。双亲是完全不依从习俗结婚的，没有求助于传统的媒人。

我并不确切知道，为什么在乌克兰出生的父亲，必须在平斯克报名服兵役，但母亲是在平斯克街头见到他的。他是一位修长、漂亮的年轻人，母亲一见钟情，甚至敢向其双亲说起他。后来找来了媒人，但只是为了作些所谓技术上的安排。但从她和我们看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她设法使她的双亲也同意，认为一见钟情就够了，虽然我的父亲是个没有父亲的孤儿，没有钱，他的家族也毫无显赫之处。不过有一条可以补偿一切的条件，他不是无知的人。孩提时他曾在犹太教神学校读过一阵子书，熟悉《妥拉》（摩西五经）。我的外祖父充分考虑到这点，虽然我一直怀疑他也受了下列事实的影响：母亲对任何重大事情决不改变主

意。

父母亲的性格完全不同。父亲，摩西·伊茨哈克·马博维奇，是个细长个儿，面貌清秀，基本上乐观的人，向来非常习惯于轻信人——除非后来证明他错了——总的说来这个特征使他的一生在世俗关系中是失败的。简单的说，他可能被称作一个无辜，一个在环境稍微好一点的情况下，也许更有作为的那种人。布卢梅，我的古铜色头发的母亲，美丽，有活力，聪明，远比父亲世故和有事业心，但同他一样，天生乐观，很善交际。不管怎样，星期五晚上我们家总是坐满了人，大多数是家族成员。我记得有成群的远近堂表兄弟姐妹和叔叔阿姨。他们没有一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免，但他们继续活在我的心灵中。他们在我们厨房围着桌子坐着，举杯喝茶，在安息日或其他假日则延续几小时地唱着——我还记得双亲盖过别人的甜美的声音在屋中荡漾。

我们不算一个特别信教的家庭，我的父母亲当然遵守犹太人的传统，饮食按照犹太教的食物卫生习惯，所有犹太节日都要庆祝。但宗教——从它能同犹太人的传统分开的意义上来说——在我们生活中作用很少。我记不起我在孩提时曾常常想到上帝或向我个人崇拜的神灵祈祷过，虽然我长大一些时——我们已在美国居住——我有时同母亲为宗教问题而争论。记得有一次她要向我证明上帝的存在，她说，“比如说，为什么天会下雨，下雪？”我向她解释学校里学到的有关雨的常识。于是她就说，“那么，果尔黛莱，如果你那么聪明，你就让天下雨吧！”由于那时没有人听到过人工降雨，我想不出答案来。至于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的说法，我从来不充分同意。看来更有理由相信的不是上帝挑选了犹太人，而是犹太人是首先挑选上帝的人，历史上作出真正革命性创举的人，正是由于这一选择，使他们成了独一无二的人

民。

在宗教方面，象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的生活和在东欧城镇或农村居住的大多数犹太人的生活方式相同。我们逢节日和斋日去犹太教堂，安息日祝福，我们用两种历本：一本俄历，另一本涉及那个遥远的地方，二千年前我们从那里被流放。那里的季节和古老风俗我们在基辅和平斯克依然沿袭。

谢伊娜（她比我大九岁）还很小时，双亲已迁到基辅了。父亲想使境遇有所改善，虽然基辅已超出移民定居地的范围，又是俄国一般禁止犹太人居住的部分，但他是匠人，如果他能通过必要的考试，证明他是熟练的木匠，他可能获得迁往基辅的珍贵的许可证。于是他做了一只精巧的象棋桌，通过了考试，接着我们就卷起行李，满怀希望地离开平斯克。父亲在基辅找到了为公家工作的机会，为学校图书馆制作家具，并领了预支款。他利用这笔钱，加上他和母亲借来的钱，自己开了一家小木匠铺，看来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但后来这个活计失败了。可能象他所说的这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缘故，而基辅是以反犹闻名的。无论如何，他很快失业了，没有钱，债好歹得还。这是我整个童年时代一再发生的危机。

父亲开始拼命在各处找事做，他经常整个白天在外边，加上夜里大部分时间。当他在俄国特有的漆黑的冬夜回家时，家里难得有菜肴供他一餐。他只能将就吃点面包和盐渍鲱青鱼。

但母亲有别的难处。四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全都病了：其中两个不到一岁就死了，两个还没有满月先后夭折。母亲伤心地哀悼每一个婴儿，但象那一代大多数犹太母亲一样，她遵循上帝的意志，没有从一排小坟中对生儿育女得出结论。于是，最后一个婴孩刚刚死去之后，毗邻的一家殷实人家来请母亲当他家的乳母，喂养

新出生的婴孩。他们只提一个条件：我的双亲和谢伊娜得从简陋阴湿的小屋搬到面积较大，比较明亮通风的房子去住。此外，一位护士将为我可怜、年轻的母亲传授带孩子的基本知识。由于有了这个“养子”，谢伊娜的生活有了改善，我也在比较有秩序，比较清洁和健康的环境中出世。我们的恩人注意母亲经常能吃饱，很快双亲有了三个孩子：谢伊娜、济普凯和我。

一九〇三年，我大约五岁时，我们回到平斯克。从不灰心的父亲现在有了新的梦想。他说基辅的失败没有关系，他将去犹太人称之为“黄金土地”的美国，并在那边发财。母亲，谢伊娜，济普凯（新出生的女儿）和我将在平斯克等他。他于是又收拾很少一点儿行装，直奔那陌生的大陆，我们则迁到外祖父母家。

虽然我在平斯克外祖父母家住了很久，但我不知道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对我有多大影响。我当然很难相信我祖父在我的一生中起过什么作用，因为他在我双亲认识之前就去世了。但不知怎样，他成了我儿童时代重要人物之一，今天在回顾过去时，我也认为他是属于这本书的。他曾是成千上万被“绑架”，被拐骗到沙皇的军队，服了二十五年兵役的俄国犹太儿童之一。这些衣衫褴褛，吃不饱，被吓昏了的儿童，经常处于要他们皈依基督教的压力之下。姓马博维奇的我的祖父十三岁时就被军队抓走。他出身于笃信宗教的家庭，从小受教育要遵循正统犹太人传统的最精华部分。他后来在俄国军队又服役了十三年。不管威胁、讥笑和不断处罚，他从未碰过犹太教所不允许的食物。这些年里，他靠生菜和面包过活，虽然他遭受强大压力，要他改变宗教信仰，由于他拒绝常常被罚一连好几个小时跪在石板上，但他永不屈服。当他复员回家时，他却被他可能在无意中违反宗教法典的恐惧心理所折磨，于是为了赎莫须有的罪，多年来他在一个不生火的犹太教

堂里一条长凳上睡觉，用石头当枕头，毫不奇怪，他年轻时就去世了。

祖父并不是我们亲戚中唯一固执——或者用对我不十分钦佩的人们经常用来形容我的更时髦的词汇“不妥协”——的人。还有我的曾外祖母。我从未见过她，但我的名字却是纪念她的。她以刚强和有点霸道而闻名。据说，不向她请教，家里从来没有人敢动弹一步。例如，我的父母能结婚实际上全靠我的博贝·果尔黛。当父亲向奈季奇外祖父请求和母亲结合时，外祖父不高兴地直摇头，想到心肝女儿布卢梅将同区区一个木匠，虽然这个木匠可以称为细工木匠结婚时，深深地叹气。但曾外祖母立刻伸出了援助之手，她坚定地说，“最重要的是，他是不是理智、成熟、负责的人，如果是，有朝一日木匠也可以成为商人……”父亲终生当木匠，但由于博贝·果尔黛的裁决，外祖父同意了这桩婚事。博贝·果尔黛活到九十四岁，我记得最清楚的关于她的轶事是，她喝茶时常常放盐以代替糖，因为，她说，“我要把犹太人散居的滋味带进另一世界去。”真有趣，父母亲告诉我说我们两人非常象。

当然，他们现在都不在人世了：他们，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东欧犹太人的农村聚居区也消失了，在火焰中毁灭了，关于这种聚居区的回忆只有在意第绪语文学中准确地保存着，它产生了意第绪语文学并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在小说和电影里再现的犹太人农村聚居区今天已在我祖辈从未听到过的地方为大家所熟知，那种令人心旷神怡、漂亮，提琴手在屋顶上永远演奏着热情的音乐的聚居区，同我记得的一切几乎毫不相干，同贫困、可怜的小小的聚居区毫不相干，过去犹太人在那小小的聚居区里辛辛苦苦地维持生计，希望总有一天情况会

好起来，相信他们的苦难是有意义的，这样来安慰自己。

他们大多数是崇敬上帝和勇敢的人，但他们的身世，同我马博维奇祖父一样，是悲惨的。我自己对于我出生的时代，从来没有，甚至一分钟也没有怀念之情，虽然过去的一切深深地影响我的一生和我的信念：即一切男人、女人和儿童，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谁，有权创造性地并且不受侮辱地生活，尤其是犹太人应该如何生活。我时常对我自己的孩子，最近还对孙辈，叙述我能隐约记得的东欧犹太人农村聚居区的生活，使我感到无比高兴的是，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堂历史课。这是他们要接受的遗产中极为重要部分的极为重要的一课，但并不是他们真正能同它融为一体的东西，因为他们的生活一开始就同过去完全不同。

父亲在美国度过了三个孤独，困难的年头。他辛苦地积攒了一些盘缠，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涌入黄金土地的成千上万俄国犹太人一样，他曾认为在美国，他肯定可以弄到一笔钱，使他能回俄国老家，并在老家建立新生活。当然，对他或者对成千上万象他一样的人来说，事情的结局并不是这样，但是他将回到我们身边来的这个信念使我们三年没有和他在一起的生活容易忍受一些。

虽然我诞生时的基辅，对我来说，已在朦胧的岁月中消失，但我却保留了平斯克某种内在的印象，可能由于我听到或读到有关平斯克的东西太多了的缘故。我后半生碰到的许多人来自平斯克或平斯克附近的小镇，包括哈伊姆·魏茨曼和摩西·夏里特的家族。

多年后我有两次几乎回到了平斯克。一九三九年当我为工会运动的一项工作在波兰逗留时，我在预定去访问这个城市的当天病倒，取消了这次旅行。后来，在一九四八年夏天，我被任命为

以色列驻莫斯科公使时，我忽然情不自禁地想回到平斯克，亲自了解一下亲友中有没有纳粹暴行的幸存者，但苏联政府拒绝让我去。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延，我将被批准去那里旅行，但一九四九年初，我又必须回以色列，我的平斯克之行就无限期地推迟了。也许这样也好；我后来听说，我的大家族全部成员中只有一位远亲还在人间。

我记得的平斯克住满了犹太人，它是最有名的俄国犹太人中心之一，犹太人甚至一度占了居民的多数。它坐落在两条大河，皮纳河和普里皮亚特河之间——都流入第聂伯河——正是这几条河流为大多数平斯克的犹太人提供了生计。他们捕鱼、卸货、搞运输，冬天里凿破巨大的冰块，然后把冰块拖到有钱人家偌大的地窖里，整个夏天地窖就是冷藏库。我的外祖父，他比双亲富裕得多，一度拥有一个这样的地窖，大热天邻居们把他们安息日或其它节日的佳肴送到地窖来，他们也来取冰供病人用。较富有的犹太人经营木材和盐的买卖，平斯克甚至还有铁钉厂，三合板厂和火柴厂，这些厂属犹太人所有，当然也为许多犹太工人提供职业。

但我记得最多的是我们家里称之为平斯克沼泽的地方，这些沼泽在我当时看来象一片泥土的海洋，有人教我们要象躲避瘟疫一样躲开它。这些沼泽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同我对哥萨克轻骑兵磨不掉的恐惧相联结，同一起冬夜里发生的事情相联结。那天夜里我跟别的孩子在靠近沼泽禁区的小巷玩耍时，突然间，好象从天空或者从沼泽里，冲来一群哥萨克骑兵，真的从我们拳曲发抖的身旁疾驰而过。“唉！我过去同你说过什么呀？”母亲事后说，她自己在发抖哭泣。

但哥萨克人和漆黑深不见底的沼泽，对我来说并不是平斯克